

《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10期

出口退税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综述

刘盈曦^{1,2}, 郭其友¹

(1.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2.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 墨尔本 VIC3168)

摘要: 本文对 18 世纪以来国内外与出口退税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 结果表明, 出口退税的理论渊源始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 近现代演化出了出口退税的中性派、非中性派、产业派和结构优化派。中性派认为出口退税是中性的, 提倡零税率原则, 但这与经济现实不符。非中性派认为出口退税具有促进出口的非中性特征, 且从实证上证实了这一特性, 但他们仅把出口退税作为增加出口和弥补总需求的工具是有局限性的。产业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使用模型工具, 清晰的指明了出口退税能够通过中间品价格、成本、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的上、下流产业四条路径影响出口退税产业, 且从实证上证实了这种影响的显著性, 这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结构优化派从理论上阐述了差别退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效应, 从实证上证实了这一效应的显著性。文章最后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出口退税; 产业结构优化; 差别出口退税率

一、引言

出口退税是出口商品减免税的简称, 指退还或免征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流通过程中缴纳的间接税。出口退税具有中性和非中性的双重特征, 能够在符合国际间公平贸易原则的同时, 促进出口发展、扩张出口产业及优化一国产业结构。目前理论界对出口退税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研究逐渐增多, 实践中也开始采用出口退税来调整产业结构, 如中国政府于 2004 年开始采用差别退税政策来优化产业结构 (郑桂环等, 2005)。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未形成体系, 也没有系统的文献综述, 鉴于此, 本文主要针对出口退税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研究进行系统综述。

本文对 18 世纪至今国内外与出口退税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效应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 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学派及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来探讨出口退税的理论渊源; 分析了近现代出口退税的中性派和非中性派的内容、贡献和局限性; 探讨了产业派的主要贡献——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及实证检验证实了出口退税对产业具有显著影响; 分析了结构优化派的主要思想及局限性, 他

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理论上阐述了差别退税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效应, 并从实证上证实了这一效应的显著性。

本世纪初金融海啸发生后, 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逐渐严峻, 此时产业结构优化成为了我国长期的政策要旨。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出口退税政策将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 对出口退税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系统综述,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 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也能使我们更好的使用出口退税这一政策工具与产业结构优化目标搭配, 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二、出口退税的经济思想渊源

(一) 早期起源——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

出口退税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重商主义时代。早期重商主义者就提出对出口商品给予补助金, 鼓励国内企业的出口欲望, 实现金银积累。18 世纪中叶的重农主义学派也认为出口产品减免税能够使本国商品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 符合“自然秩

作者简介: 刘盈曦 (1984 -), 女, 云南昆明人,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莫纳什大学访问博士生,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研究; 郭其友 (1963 -), 男, 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经济学流派、开放宏观经济学及产业经济学研究。

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谈到国际税收问题时，指出对本国的出口商品免除应缴纳的国内消费税，能够使这些商品避免二次纳税，这已具有了消费地课税原则下避免重复征税问题的雏形。

(二) 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联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出口退税是奖励出口的最好手段，因为它能够在不干扰市场经济自由运行的前提下，促进出口发展，优于其他形式的出口补贴和出口奖励。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联系起来的人，他提出一国应该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集中资源生产和出口的“绝对优势”产品，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提高本国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增加国民财富。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扩展了与贸易政策相联系的产业政策的适用范围，指出一国只要具有了“比较优势”，就可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使用出口退税以“有利输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出口退税产生于非中性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背景下，虽然重农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逐渐认识了它的中性特征，但到了斯密和李嘉图时期，在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前提下，使用出口退税的重点仍在于其非中性特征，可见中性特征是前提和基础，而非中性特征才是出口退税的价值所在，但这价值需要通过与产业发展相联系体现出来。

三、对出口退税认识的深化

(一) 出口退税中性派

中性派对出口退税的认识主要以中性税收政策工具为主，提倡零税率原则，以避免双重征税，实现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Milledge W. Weathers (1986)、潘明星 (1997)、马玉璞等 (2000)、刘剑文 (2004) 和裴长洪、高培勇 (2008) 等都持这种观点。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对出口退税的中性特征的认识深刻入理，不足之处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还存在各种关税壁垒，单纯强调出口退税的中性特征不符合经济现实。

(二) 出口退税非中性派

非中性派对出口退税的认识更贴近现实，他们看到并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出口退税确实有促进出口发展的非中性特征。如 Arvind Panagariya (1992) 发现在有贸易保护的国家，出口退税被作为一种鼓励出口增长的工具来使用。因此，出口退税政策被称为“新自由贸易工具” (Elena Ianovichina, 2003)。实

证检验方面，Chi - Chur Chao 等 (2001) 基于中国 1978 - 1998 年的数据使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肯定了出口退税对出口扩张的促进作用。Chien - Hsun Chen 等 (2006) 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检验法基于中国 1985 - 2002 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同样肯定了中国出口退税对出口的扩张作用。因此，他们提出把出口扩张作为出口退税的政策目标，走出口退税非中性路线，促进经济发展。然而这种单方面注重经济量的增长和全面推动出口扩张的方式，引起了部分经济学家的反对和置疑。

(三) 对非中性出口退税的置疑

出口退税的反对派以唐倩和茅于軾为代表，他们置疑非中性出口退税政策的合理性，建议取消出口退税，因为：1. 出口退税政策间接强调了价格竞争，易导致企业忽视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非价格因素的竞争和自身效率的提高 (唐倩, 1996)；2. 当使用出口退税政策的目的是依靠增加出口来弥补总需求不足时，容易造成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低效和产业结构老化，耽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 (茅于軾, 2001)。这些置疑是较为中肯的，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以上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出口退税政策单方面关注出口扩张而忽略了结构调整优化，即问题在于出口退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方法上，而不是出口退税政策工具本身，反对派提出取消出口退税的建议有点因噎废食了。

四、出口退税的产业派

针对以上置疑，出口退税的产业派兴起，他们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出口退税被作为增加出口和弥补总需求的手段来使用，即政策目标设置不合理，因为非中性的出口退税不但能引起出口波动，还能影响出口退税产业。因此出口退税的目标设置应该与产业发展联系起来，使以上问题迎刃而解。产业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使用模型工具较为清晰的阐述了出口退税对产业的影响路径，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一) 出口退税对产业的影响路径

产业派指出出口退税通过中间品价格、成本、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的上、下流产业四条路径影响出口退税产业。

1. 进口中间品价格。出口退税能够使存在贸易保护国家的出口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以国际市场价格获取进口部件，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促进该国出口产业出口和发展。Keesing (1988) 指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核心条件就是为

出口部门提供世界市场上快速、有效购买进口部件的渠道。出口退税正是在一国维护进口保护的同时，使出口产业能够以国际市场一般价格获得进口部件的有效方法，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中国和泰国等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Thomas V. J, 1990)。因此，出口退税成为了一种对抗本国贸易保护、鼓励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大贸易秩序的手段，从而促进出口产业发展 (Robert Wade, 1991)。Olivier Cadot (2003)、Elena Ianchovichina (2003)、Jai S. Mah (2007) 和 John Weiss (2005) 等也都支持这一看法。

2. 成本。出口退税有利于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因而能够提高行业利润、产量和就业率，引起出口产业扩张 (刘怡, 1998; 刘小军, 1999; 金兴健, 2002; Robert J. Carbough, 2008)。Chien - Hsun CHEN 等 (2006) 引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他们假设两个企业，本国企业 1 和外资企业 2，都使用进口中间品生产同质商品，国内企业 1 的商品在国内市场和第三方市场销售，销售量分别为 D 和 E，外资企业 2 的商品全部出口到第三方市场，销售量为 Y。国内企业 1 和外资企业 2 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pi^2 = (a - bD - c)D - (1 + t)mD + \{\alpha - \beta(E + Y) - c\} - (1 + t)mE + \gamma t m E \quad (1)$$

$$\pi^2 = [\alpha - \beta(E + Y) - c^* - m]Y \quad (2)$$

其中 c 和 c* 分别是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边际成本，t 是进口部件缴纳的进口税，m 是中间部件的进口价格，γ 是出口退税率。求最优解后，再求利润函数对出口退税率 γ 的全微分，得：

$$\frac{d\pi^d(\gamma)}{d\gamma}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D} \frac{\partial D}{\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E} \frac{\partial E}{\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Y} \frac{\partial Y}{\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gamma} = \frac{4tmE}{3} > 0 \quad (3)$$

因此，提高出口退税率，能够提高本国企业利润，促进出口退税行业的生产扩张。

3. 资源配置效率。出口退税能够引起要素重新分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出口退税产业发展 (刘怡, 1998)。Chi - Chur Chao 等 (2006) 引入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他们假设本国经济中，生产三种类型的产品：可出口品 X，可进口品 Y 和中间品 M，投入三种生产要素：劳动力 L，资本 K 和中间部件 M。Md 是生产中间品 M 时的国内投入品，价格为 v_α，Mf 由国外进口，含税（进口税）价格为 v_f = v_f* + t_∞。设 α (= M_f/Q_x) 为每单位 X 中国外进口中间品所占比例，则每生产一单位 X，需缴纳 tα 的进口税。设出口退税率为 ρ，每出口一单位 X，出口退税额为 ρtα，当国内市场价格与国外市场价格均衡时，p = p

* + ρtα。设 X 的价格为 p，Y 的价格为 p，此时劳动力市场的出清条件是：α_w (w, r) Q_x + β_w (w, r) Q_y + γ_w (w, r) M_d = L，资本市场的出清条件是：β_r (w, r) Q_y + γ_r (w, r) M_d = K，中间品市场的出清条件是：μv ($\frac{M}{v_d}$) = M_d。其中 α_w (w, r) 为单位成本函数 α (w, v) 对 w 求导，β_w (w, r) 和 γ_w (w, r) 等同理。在稳定性条件下求解可得：

$$dw/d\rho = \beta_r (t\alpha + dp^*/d\rho) / \Delta > 0 \quad (4)$$

$$dr/d\rho = -\beta_w (t\alpha + dp^*/d\rho) / \Delta < 0 \quad (5)$$

$$dv_d/d\rho = (\beta_r \gamma_w - \beta_w \gamma_r) (t\alpha + dp^*/d\rho) / \Delta > 0 \quad (6)$$

其中，Δ = β_r + A (β_rγ_w - β_wγ_r) > 0，同时 A = [$\frac{\alpha\mu}{v_d(1-\mu)}$] [v_f + t (1 - ρ + μρ)] > 0。因此，Chi - Chur Chao 等推算出，出口退税率调整会引起要素价格（包括工资、利率和中间部件价格）波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带来出口退税行业的扩张。

4. 扩张相关上流和下流产业。Chi - Chur Chao 等 (2001) 指出由于出口退税率的变动能够引起劳动力、资本和中间部件等要素均衡价格的波动，从而扩张与出口退税产业相关的上下流产业，促进出口退税产业的发展。因此，出口退税政策的使用，不但能够影响单一产业的发展，而且能够扩张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二) 实证检验

出口退税产业派的经济学家们，不但从理论模型上分析了出口退税对产业的四个影响路径，还从实证上证实了这种影响是显著的。实践中，美国、法国和日本都曾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选择性的对一些特定行业，如半导体行业、电子器械行业等，使用出口退税政策扶持其行业发展，结果有效地提升了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位置，促进了行业扩张 (Barbara J. Spencer, 1986; Michael Borrus 等, 1986)。此外，中国 2004 年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对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医药生物行业利润有 5% - 10% 的显著负面影响 (李汉桥, 2004)，对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有约 20% 的负面影响 (陈军才等, 2005)；2007 年中国出口退税率下调对主要制造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Elena Ianchovichina, 2004; Richard S. Eckaus, 2008)，对机械工业的企业利润和产出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郑国伟, 2007)，对纺织行业的出口也有负面影响 (向洪金等, 2010)。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军才等 (2005) 使用了较为先进的干预

计量分析法,来分析中国2004年出口退税率的下降对各产业的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Z_t = \frac{\omega(B)B^b}{\varepsilon(B)}y_t + N_t \quad (7)$$

$\omega(B) = \omega_0 - \omega_1(B) - \omega_2(B)^2 - \dots - \omega_s(B)^s$, $\varepsilon(B) = 1 - \varepsilon_1B - \varepsilon_2B^2 - \dots - \varepsilon_rB^r$,其中 B 表示滞后算子, N_t 为任意 ARMA 模型,干预序列变量为:

$$y_t = \begin{cases} 0, & t < 2004 \text{年} 1 \text{月} \\ 1, & t \geq 2004 \text{年} 1 \text{月} \end{cases}$$

(三) 评价

产业派的贡献主要有: 1. 认识到出口退税不只能影响出口,而且能影响产业发展,因此他们把出口退税的政策目标与产业发展联系起来,有了一定进步; 2. 出口退税产业派出现后,出口退税对产业的影响路径不再像一个黑箱子模糊不清,而是被模型化和数理化,被清晰、有逻辑、明确的阐述出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3. 使用较为先进的计量工具,从实证上证明了出口退税对产业影响显著,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的研究视角不够广阔,只考虑到出口退税对单一产业的影响,没有从宏观上考虑,也没有考虑到产业间协调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问题。

五、出口退税的产业结构优化派

针对产业派的不足,产业结构优化派兴起,他们提倡综合运用几种不同出口退税率,来配合一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中国的经济学者们首先提出使用差别出口退税率调整产业结构。

(一) 差别出口退税率

结构优化派指出,既然出口退税通过中间品价格、成本、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的上、下流产业四条路径影响出口退税产业,那么受到出口退税“偏爱”的产业,即获得较高出口退税率的国家产业政策扶植的支柱产业和有较好前景的新兴产业,能够以世界市场的一般价格获取中间加工部件,可降低成本,获取较高的利润,更有效率的配置资源,促进相关的上、下流产业的更好发展,从而引起行业扩张;反之,受到出口退税政策“抑制”的产业,即获得较低出口退税率、甚至零退税率的易引起贸易摩擦、产能过剩、生产低效的产业,只能以高于国际一般价格的“高价”购入中间投入部件,或购买质量较低的国内生产部件,导致国际竞争力降低、利润下降,上、下游相关产业收缩,从而引起行业收缩 (Keesing, 1988)。因此,结构优化派提出可以把出口退税作为

实现一国“产业战略”发展的有效工具 (James A. Brander 等,1983),建立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目标对不同行业设置不同出口退税率的差别出口退税率制度,引导产业走向、防止重复建设、引导资源从低退税率的出口行业转向高退税率的出口行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王复华,1998; 刘小军,1999; 马芸,2007; 何晴等,2009; 郭辉明等,2004; 王晓雷,2007)。

(二) 实证检验

出口退税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也被结构派通过实证检验所证实。John Weiss (2005) 发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中,亚洲四小龙 (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出口补贴政策。此外,中国经济学家也使用事件分析法,来检验出口退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分析模型如下:

$$exsa_g_t = c + \sum_{i=1}^n \alpha_i exsa_g_{t-i} + \sum_{j=0}^m \beta_j eer_g_{t-i} + e_t \quad (8)$$

其中 $exsa_{g_t} = (exsa_{y_b_g} / exsa_{j_g}) \hat{\cdot}$; $exsa_{y_b_g}$ 为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月度变化率,定义为季节调整后的一般贸易出口总量的自然对数形式的一阶差分, $exsa_{j_g}$ 以相同方法定义; eer_g_{t-i} 为有效汇率指数 EER 的月度变化率,定义为 EER 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 EER 根据 Bahmani - Oskooee 方法构造:

$$EER = \sum_{i=1}^n \alpha_i \left[\frac{(R_i)_t}{(R_i)_0} \right] \times 100 \quad (9)$$

其中, R_i 为每一单位人民币兑换贸易伙伴国 i 的货币数量的双边名义汇率。使用这一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2004年的差别出口退税率调整长期内结构性影响显著 (郑桂环等,2005; 王斐波等,2009)。此外,中国2006和2007年的差别出口退税率改革在提升出口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王晓雷,2008; 杨雄飞等,2009)。

(三) 评价

基于产业派的研究结果,结构优化派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使用差别退税率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思想,从理论上清楚的阐述了差别出口退税率政策如何起到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最后使用事件分析法等当代计量方法,证实了这一作用的显著性。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缺乏相关的模型支持,同时,使用差别退税率来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可操作性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六、结语和展望

本文对18世纪以来国内外与出口退税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开始,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了对出口退税的探讨,至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时期,他们把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联系起来;到了近现代,对出口退税的认识逐渐深化,从中性派、非中性派演化到产业派和结构优化派。中性派认为出口退税是中性的,提倡零税率原则,但这与经济现实不符。非中性派则认为出口退税具有促进出口的非中性特征,且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这一特性。但他们仅仅把出口退税作为增加出口和弥补总需求的工具,这一认识具有局限性。产业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使用模型工具,清晰的指出了出口退税能够通过中间品价格、成本、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的上、下流产业四条路径影响出口退税产业,并从实证上证实了这种影响的显著性,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结构优化派从理论上阐述了差别退税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效应,并从实证上证实了这一效应的显著性。

把优化产业结构引入到出口退税的政策目标中,这为出口退税问题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然而,目前还有一些新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譬如:目前差别出口退税政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还缺乏相关的、系统的理论模型支持;现有计量回归中内生性问题还不能完全排除,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和无偏性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使用差别退税率来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可操作性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世纪初金融海啸发生后,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逐渐严峻,此时产业结构优化成为了我国长期的政策要旨,可以预见出口退税政策将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更好的使用出口退税这个政策工具与产业结构优化目标配搭,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布阿吉尔贝尔.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M]. 伍纯武,梁守锵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 [2] 威廉·配第. 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 [M]. 邱霞,原磊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6.
- [3] 威廉·配第.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 [M]. 陈冬野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 [4]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

[5]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 [M]. 彼罗·斯拉法主编.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

[6] 潘明星. 零税率与我国的出退口税制度 [J]. 当代财经,1997,(11).

[7] 马玉瑛,李东明. 我国实行出口退税问题的探讨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8] 刘剑文. 出口退税制度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9] 裴长洪,高培勇. 出口退税与中国对外贸易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

[10] 汤贡亮,李成威. 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J]. 税务研究,2002,(12).

[11] 唐倩. 取消出口退税乃大势所趋 [J]. 国际商务研究,1996,(5).

[12] 茅于軾. 出口退税未必合适 [J]. 大经贸,2001,(4).

[13] 刘怡. 出口退税: 理论与实践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14] 刘小军. 关于“战略性出口退税制度”的设想 [J]. 涉外税务,1999,(12).

[15] 金兴健. 人民币贬值政策与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比较分析 [J]. 财贸研究,2002,(2).

[16] 王复华,叶康涛,彭飞. 次优出口税理论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完善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8,(4).

[17] 郭辉明,屠庆忠. 试论最优出口退税率 [J]. 经济论坛,2004,(13).

[18] 陈军才,林伟斌. 出口退税率调整对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分析 [J]. 税务与经济,2005,(5).

[19] 何晴,张斌. 出口退税政策: 总量与结构 [J]. 税务研究,2009,(1).

[20] 马芸. 出口退税改革对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J]. 辽宁经济,2007,(3).

[21] 王晓雷. 对外经济均衡、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J]. 税务研究,2007,(6).

[22] 李汉桥. “出口退税”调整影响部分行业 [J]. 经济研究参考,2004,(7).

[23] 郑国伟. 2007年进出口关税调整对机械工业的影响与建议 [J]. 制造技术与机床,2007,(2).

[24] 向洪金,赖明勇.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出口

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 (10) .

[25] 郑桂环,汪寿阳. 新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事件分析法的一个新应用 [J]. 公共管理学报, 2004, (3) .

[26] 王斐波,刘斯敖.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贸易结构的短期影响——基于事件分析法 [J]. 经济论坛, 2009, (1) .

[27] 王晓雷.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出口规模与出口结构的影响 [J]. 国际贸易, 2008, (7) .

[28] 杨雄飞,朱燕. 浅谈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J]. 商业时代, 2009, (11) .

[29] 张榕,杨树琪.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取向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0, (4) .

[30] Arvind Panagariya. Input tariffs, duty drawbacks, and tariff refo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v. 32 (1992), pp. 131 – 147.

[31] Bghmani – Oskooee M. Real and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for 22 LDCs: 19711 – 19901V [J]. *Applied Economics*, 1995, 27: 591 – 604.

[32] Chi – Chur Chao, W. L. Chou. Export Duty Rebates and Export Performance: Theory and China's Experienc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 29 (2001), pp. 314 – 326.

[33] Chi – Chur Chao, Eden S. H. Yu, Wusheng Yu. China's import duty drawback and VAT rebate polici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China Economic Review*, No. 17 (2006), pp. 432 – 448.

[34] Chien – Hsun Chen, Chao – Cheng Mai, Hui – Chuan Yu. The effect of export tax rebates on export performanc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No. 17 (2006), pp. 226 – 235.

[35] Barbara J. SPENCER. Paul Krugman. What should trade policy target?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July 8, 1986), pp. 69 – 89.

[36] Elena Ianchovichina. GTAP – DD: A Model for Analyzing Trade Reforms in the Presence of Duty Drawbacks. *The World Bank GTAP Technical Paper*, No. 21 (February, 2003) .

[37] Elena Ianchovichina. Duty drawbacks, competitiveness and growth: Should China Reform its Duty Drawback System? *EcoMod20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gtap.agecon.purdue.edu

[38] Jai S. Mah. Duty Drawback And Export Promotion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40. No. 2 (2007), pp. 133 – 140.

[39] Jai S. Mah. The effect of duty drawback on export promotion: The case of Kore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No. 18 (2007), pp. 967 – 973.

[40] James A. BRANDER, Barbara J. SPENCER. International R & D Rivalr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0, No. 4 (Oct., 1983), pp. 707 – 722.

[41] John Weiss. Export Growth and Industrial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xperience. *ADB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26. (February 2005) .

[42] Keesing, D. B. Adjustment and Export Development, mimeo, Trade Policy Division, Country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ld Bank. (1988) .

[43] Michael Borrus, Laura D' Andrea Tyson, and John Zysman. Paul Krugman. Creating Advantage: How Government Policies Shap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July 8, 1986), pp. 91 – 114.

[44] Milledge W. eathers, System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5, No. 4 (Dec., 1971), pp. 54 – 62.

[45] Olivier Cadoty, Jaime de Melo, Marcelo Olarreaga. The protectionist bias of duty drawbacks: evidence from Mercosu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9 (2003), pp. 161 – 182.

[46] Richard S. Eckaus. An Inquiry into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Exports of China and Indi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6, No. 5 (2008) .

[47] Robert J. Carboough.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inthrop Publishers (1980), pp. 170 – 173.

[48] Robert Wade. How to Protect Exports from Protection: Taiwan's Duty Drawback Scheme.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4, Issue 3 (September 1991), pp. 299 – 309.

[49] Thomas, V., J. Nash, and Associates, Best practices in trade policy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编辑校对: 段钢 孙敏)